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4/498
1 September 198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66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1989年8月30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转交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先生将于1989年9月1日在德国联邦议院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发表的政府声明的英文全文(见附件)。

请将本信和所附政府声明作为临时议程项目66的大会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汉斯·奥托·布劳蒂甘(签名)

* A/44/150.

附 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1989年9月1日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

在联邦议院发表的声明

今天，我们在德国，欧洲和全世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五十年前爆发。作为自由选举的德国人民的代表，我们对这个纪念日负有特别的义务。我们要以这一天所要求的严肃态度对待这种义务。

今天，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们心情沉重并感到责任重大。我们负有特别的责任，是因为当时控制德国的犯罪政权发动了那场战争。我们对德国人和以德国的名义给各国人民和各国造成的难以尽言的痛苦深感沉痛，我们也哀悼我们自己国家的很多无辜受害者。

这个战争是一场种族民主和毁灭的无情战争，这正是战争罪犯们所要求的。它造成了一种空前规模的恐怖，这种恐怖再也不应重复发生。这是一种专制思想的最终结果，这种思想狂热也尊崇一个单一的种族。

为了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特别是对欧洲犹太人的空前的种族灭绝的所有受害者，为了被希特勒发动的奴役和消灭总体战争所残害的波兰人，为了辛迪人(Sinti)和罗马尼人(Romanies)，为了国家社会党暴政的很多其他受害者，我们有责任不忘记过去。

我们悼念希特勒独裁政权首先在德国，然后在世界实行镇压和剥夺基本人权的受害者，我们悼念战场上和家中的无辜受害者，以及被驱逐的受害者。

我们还怀念来自很多国家的被俘后遇害和回家时致残的数以百万计的士兵。谁能忘记那些空等丈夫的妻子，和那些空等儿子的母亲！多少儿童丧失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回忆无辜的受害者意味着铭记那些可怕的日子，就象它们发生在今天一样。必须永远将它作为对我们的警告。不能用错误的对此使其淡化。我们应该防止不加思索或在争论时使用象“法西斯主义”这样的词来形容目前的情况。

不仅仅有人企图对过去轻描淡写。对目前的痛苦视而不见也是轻率的和冷酷的。让我们现在记住那些仍然被剥夺尊严和自由的人民和国家。

在那次世界大战和1939年到1945年期间所造成的破坏后在，奥斯切维茨和巴比贾尔后，在奥拉杜尔和利迪策后，我们的世界和以往再也不会一样了。因此，必须反复地研究传统和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只有努力保持永远无法毁灭的良好事物，连续性才有意义。这包括我们国家历史的自由传统。它是我们塑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道德基础，这个共和国是德国土壤存在过的最自由的社会。

确实，甚至在1945年后，一些拒绝接受教训的人仍然坚持过去的主张，但他们受到绝大多数幸存者的强烈谴责和彻底的驳斥，因为这些幸存者亲身经受了过去的罪恶的理论的后果，并且非常熟悉它们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历史上的邪恶不会永世长存。这给人们以希望。希特勒狂热的信仰一个种族国家，拒不接受所有历史经验。但是，历史超越了他。十二年后，他的所谓“千年帝国”消失在废墟和灰烬中。

确实，很多德国人和国外的一些人被这个暴君所蒙骗。但是，只能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独裁政权的罪行，它的毁灭运动和它的种族灭绝来对它进行评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创伤尚未愈合。它们深印于各民族的心灵中。但是，它们也给个人留下了印记，包括每一个经历了那个恐怖时期的人，即使当时还是个孩子。我到现在也不能摆脱1939年以及随后几年在我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1939年时我只有9岁。我仍然能记得对我的家乡城镇可怕的夜间轰炸，以及

横卧街道和倒塌房屋中的很多死人。

许多人仍然清楚的记得“死亡列车”的牲畜车厢，其中装满了送往灭绝营的人；使数以百万计的士兵经历恐惧、匮乏和死亡的战场；由衰弱的儿童，妇女和老人组成的似乎没有尽头的行列，他们或者是在逃难，或者被驱逐；火车装载着难民，车上妇女怀抱着冻僵的孩子。

在那场恐怖中无辜丧生的人和幸存的人，对我们都是一个警告，让我们不要忘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必须以人的不可剥夺的尊严作为我们的行动准则。最脆弱的人的尊严必须是我们的试金石。

我们必须保持对过去的记忆，特别是在德国。这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它也帮助我们负责任地塑造我们的社会。它也是我们今后能否这样做的先决条件。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不同，在1949年后，没有关于战争罪责的讨论。希特勒需要这场战争，拟定计划和发动了这场战争。对此没有也不能有任何怀疑。我们必须强烈的反对修改这种评价的任何企图。诚实以及政治和道德节操要求我们这样做。开明的爱国主义也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希特勒的毁灭运动归根结底也是针对德国民族本身的：他在面临完全失败时，想把德国与他一同拉进深渊。他曾大谈“民族社会”，但他实际上排除，而不是包容这个民族的很多部分。他着迷于种族的概念，使一切，甚至包括民族的概念都服从种族的概念。

他曾大谈“天意”，但他实际上想摧毁宗教纽带和基督教伦理道德。欧洲的道德文化对他来说毫无价值；他自己的专制是一切。

今天，我们可以满意的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我们的自由社会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君们所追求的任何东西都大不相同。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我们通过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坚持自由与和平，并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立国的稳固基础正是那些希特勒所深恶痛绝和疯狂抵制的价值标准。

二

在联邦参议院就我国宪法《基本法》进行辩论的先生和女士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对比。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采取行动。他们曾经亲眼目睹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生。但是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最终导致的结果出乎他们大多数人的想象之外。因此他们的座右铭是“倘能成功，及早抵制”。因为这场灾难不是从1939年开始，而是早几年，甚至在1933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事态的发展最初还可以制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制止和扭转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还教育我们，不论为何种目的赋予的权力只能够通过抗衡的权力来制约。

我们今天提出以下看法，丝毫不打算减少国家社会主义统治者的罪行：

在国内，社会和政治精英阶层失败了。许多精英分子拒绝支持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后来，许多精英分子（有些人直到最后）还幻想通过妥协和合作来遏制国家社会主义的疯狂行为。

另外一个事实是，欧洲各国无意中助长了事实上有利于希特勒计划的事态发展。这些国家对希特勒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普遍渴望“我们这一代的和平”（如张伯伦1938年在慕尼黑协定之后所说的那样）当然可以理解，但是这也表明他是一个没有远见的总理。重要的是当时就具有警惕的目光，看穿独裁者的计划。

只有权力的全面均衡才能可靠地保证持久和平。但是真正的和平还需要更多的条件。为此，我们在《基本法》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是每一个社会的基础，是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验表明，如果只有一方抱有善意，就不可能保持公平的平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态发展教育自由国家认识到保持警惕是多么重要。

尽管我们现在正在目睹同东欧和东南欧邻国的关系正在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保持警惕这一点今天仍然有效。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个时代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将持续下去。我们将竭尽全力为这种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德国人赋有特殊的责任这样做，尤其是考虑到1939年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我们认识到我们承担的特殊责任，因为希特勒在签订了许多人称之为魔鬼条约的那项条约之后入侵波兰。波兰因此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和毁灭性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

当时达成的各项协定是对波兰、波罗的海各国、芬兰和罗马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无耻侵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辩解，更没有理由为侵犯自决权作辩护。我们彻底谴责这种侵犯和后来的暴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多次指出，1939年的各项协定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言法律上无效。这也意味着，该条约本身以及后来的补充协定绝对不能证明第三帝国和苏联后来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合法的。

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是两种独裁制度无耻交易的产物。其中一种独裁制度永远消失于他自己制造的地狱之中。苏联现在（在斯大林死后36年）正处于一个根据“新思维”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分析这一痛苦的进程。

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形势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迫结束。我们的祖国被分裂。对生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和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许多国家的人民而言，战争的结束标志着代替原有独裁的新独裁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部分解释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原因，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绝对不能证明这种分裂是合理的。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今年6月在波恩说战后阶段正在结束。这种评论为由于欧洲和德国的分裂而直接遭受痛苦的所有人民和国家提供了希望，因为这种说法意味着用和平手段克服现存的局面。

三

在许多代人当中，分裂的波兰顽强地坚持国家统一的概念。只要尚未通过自由的自决方式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对波兰命运的记忆，能够帮助我们德国人承担分裂的负担。

在争取国家自决这一共同愿望方面我们感到同波兰人民尤其亲近。德国书籍出版和平奖获得者弗拉迪斯罗·巴托斯泽维斯基饱受国家社会主义暴政的迫害，他在不久前谈到该主题时说：“克服德国的分裂也符合波兰的利益。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西方出现一个民主制度。”

巴托斯泽维斯基教授签署了纪念1989年9月1日的波兰和德国天主教徒联合声明，标题是“争取欧洲的自由、正义与和平”。波兰新总理达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也签署了该声明。我愿借此机会向担任这一困难职务的马佐维耶茨基总理表示最美好的祝愿。我们希望他成功，我们愿意竭尽全力在这一方面协助他。

毫无疑问，华沙条约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展现了一种历史前景，即所有在过去数十年中被剥夺人权的欧洲人（因此包括所有德国人）将享有人权。

我国政府决心利用这种机会。康拉德·阿登纳1961年6月11日在西里西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欧洲有一天将成为所有欧洲人的共同大厦，一座自由大厦”。

在未来的欧洲，主要关切事项必须是自决和人权——人民主权而不是边界或领土。将来完成欧洲建设的不是主权国家，而且主权人民。

欧洲再也不能象格里帕泽尔上世纪所预测的那样，从人道主义开始、经历国家主义、最后陷入野蛮这样一条灾难性道路。德国人以为德国的名义对波兰人民作出了令人发指的事情。在这个国家中有谁还记得，当初设在波兰的集中营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有计划地铲除波兰民族的精英分子？

我们只有讲出全部真象才能达成和解。真象的一部分是，有两百多万德国人作为难民或被驱逐出境者而死亡。丧失自己的故土在数百万德国同胞的心上留下了深刻的疮疤。不能压抑这种痛苦的经历；我们想从中汲取教训。德国人和波兰人清算旧帐有何意义？令人遗憾的是在德国和波兰都有一些人算旧帐。后代将根据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对我们作出评价，以便他们能够在和平和共同自由的环境下生活。

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解和友谊表明怎样才能填平存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鸿沟。我们同以色列国以及全世界犹太人的关系表明在深渊之上也能架起桥梁。

我们寻求德国人民和波兰人民之间的理解。这是我们的义务，这符合两个民族的愿望。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冯·魏茨泽克总统在给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总统的贺电中表达了他的诚挚愿望。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50年之后，终于到了实现持久和解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在波兰、法国以及后来在苏联的抗德战争中出现的仇恨情绪，苏联在战争中死了二千万人民。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曾在德国人的手中遭受巨大痛苦。今天许多欧洲国家是我们的伙伴，甚至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感谢所有在经历战争和暴政之后伸出和解之手的国家，首先是美国，这些国家在早期阶段慷慨提供食品援助和建设援助，令人难忘地表现出积极的仁慈和政治远见。象杜鲁门总统和乔治·马歇尔这样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许多私人个人参加了这种和平努力。

在这方面，我想提一下法国的约瑟夫·鲁范，从达豪集中营释放出来几个月后他写出了这样的句子：“我们的敌人越铲除人的特征，我们就越要尊重并珍视这些特征。”

在过去数十年中，在实现同波兰的和解方面已经采取了突破性的步骤。在这方面我特别想提到教会采取的积极行动。

前总理维利·勃兰特签署的1970年华沙协约在和解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

我们将继续遵守该协约的文字和精神。在该协约序言中，波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表示愿意确保新一代的和平未来，这代人在这段时间已经长大成人，并表示要为“和平共处和发展正常的友好关系打下牢固的基础”。

波兰在1980年代初期经历了一个困难的阶段，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民自发地提供了慷慨援助，表现了他们同波兰人民的团结。

我确信，波兰社会的开放将对我们的努力产生有利的影响。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的机会将会更多，波兰在个人自由方面的进展将会更大。和解不仅取决于人的意志，还取决于政治环境。

在边界可以跨越、信息和意见可以自由交流、在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可以在自由的条件下互访的情况下，偏见和不信任将无法持续下去。

法国和德国的和解非常成功，主要是因为这种和解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共同基础上，并且是因为通过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更多的接触和对话逐渐产生了新的相互理解。

四

在失去自由的地方，和平很快会丧失——首先在国内，接着往往同样发生在国外。

希特勒的独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三警告我们极端主义或实际上极权主义具有的诱惑力。极端主义的危险，即使是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里，也一直是存在的。

因此民主国家尽快对付这种诱惑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国家社会主义专政的背景，这意味着通过法治保护人民不会有一日遭到极权主义的统治。

自由和民主不是抽象的原则。它们最直接地影响每个人。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在危险中。让我们一起保证人民始终警惕这件事！

必须防止人民产生极权专政具有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表现于诱惑和暴力，正义和非正义，遵从和胁迫。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使善良的人民陷入一个使人困惑的魔网中，要逃出这个网是越来越难的。

善与恶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个人的诚实越来越不能保证其行为是正确的。因此用黑和白来截然判定我们父辈和祖辈人是不公平的。

直到今天我们德国人仍然痛苦地知道在希特勒发动战争期间生活的矛盾性质。那个时代的悲剧之一是，好几百万人的忠心和爱国——不论是在前线或在国内——被误用于罪恶的目的。

极权主义体制的背信弃义和乖张之处是，它故意将人民置于实际上除了引起内疚或使自己遭受危险别无他途的境地。

—— 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打战和受苦。他们中大多数人诚实地深信他们在忠实地为国家服务。许多勇敢和高尚之举值得深深的尊敬。

这种态度不应被轻视或嘲笑，因为它们是死亡、痛苦和恐惧的经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痛苦异常的良心不安。

—— 另一方面是纳粹所犯的罪行。它们不能与战争期间发生的事分开。那个时候许多人在这种矛盾下受苦。

当我们说到国家社会主义造成的破坏时，我们也应记住对人民心灵的破坏。这不仅是面临这种窘境的人，而且也是其子孙情感上的重担，他们自己必须努力对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作出公平的裁判。

我们应谨防从今日有利的地位匆忙作出判断。我们当中有谁敢问心无愧地说，在面对这种邪恶时，会有勇气捐躯？我们当中谁能裁决当时不仅危及自己生命并且也会危及家人生命的事物？

现代的人并不比那个时代的人更好或更坏，但是他们未在极权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被迫作出决定。

我们感激地回顾，即使在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期间，在战争和专制统治时期，人性仍未被摧毁。在战争前线到处可见慷慨助人与人性的动人的事例。

男人和妇女奋起抵抗。有些人最初为独裁者服务，后来他们认识到他们——无疑象大多数德国人一样——被欺骗、出卖和利用，他们有勇气转过来，许多人并为此丧失生命。

只有民主制度不会期望人民作在正常情况下超过他们能力的事。民主制度使他们免于作出国家社会主义专制要求他们作出的可怕决定：成为帮凶（这太容易了），或表现英勇气慨。

正是关于希特勒独裁的记忆，促使我们反对许诺能解脱这个世界一切罪恶的任何运动。这些人——不论他们能提出什么预兆——作出这种允诺，一定是走向新的灾难。他们没有从经验学到任何东西。

近代历史上的灾难教育我们，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共同的价值，也没有道德上的妥协。自由和奴役必竟象水火一样地不容。

专制会欺骗和蒙蔽，只有民主能给人自决。民主靠其缓和意识、健全逻辑和可预见性使人深信不疑。民主之伟大就在于这种谨慎——同时，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认为民主没什么吸引力的原因。

民主不是为了制造无止境的欢喜局势，而是为了创造平凡的正常生活。以民主一词的最佳意义而言，它不适合英勇和非凡的事迹，而适合人的正常的行为。

政党和反对派的权利，是民主制度的生动体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希特勒非常残酷无情地打击政党；这个独裁者很清楚地知道一旦政党被铲除，民主制度也就死了。

我们应当时常想到，战后时代的主要政治家——诸如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和基民盟的第一主席安德烈亚斯·赫尔梅斯——都亲自经历了国家社会党专制的监狱、集中营及死囚牢房。

到1933年为止这段期间，我们从认识中得出的结论必定是，极端主义，不论左的或右的极端主义，唯有在人民不支持或不关心民主党派时才会成功得逞。

此外，如果社会和政治精英出手——他们可能幻想有办法对付极端主义者——，灾难也难以避免。

如果我们在这种发展之初就加以摧毁，极端主义不会有机会。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当作正常事物，则将会威胁到民主制度，打击这种趋势永远不嫌早。

让我们不要给我们的民主制度施加太大的压力——它是一种宝贵的、同时是脆弱的资产。让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它是这个世界一切苦难和问题的万应药方。

让我们随时随地维护民主制度和法治——唯有它们才能保证所有人民享有自由和正义。唯有它们才能使个人免于极端主义的危险——因此每个人要把这些当作自己的切身利益。

五

正义、尊重法律和法律保障对民主来说至关重要，就象我们离不开空气一样。这是德国抵抗运动的遗产。一贯保卫法制的人，决不会有一天去反对那些要求法制的人。

恢复正义、恢复对法律和法律保障的尊重是抵抗运动的主要目标，至少对勇敢反抗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因此，今天我们同样也向下列人士致敬：

——家具匠约翰·格奥尔格·艾泽，

——克劳斯·格拉夫·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

- 以赫尔穆特·雅姆斯·克雷夫·冯·莫尔特为核心的“克雷索集团”，
- 以索菲和汉斯·舍尔为代表的“白玫瑰”，
- 象尤利乌斯·勒伯尔和卡尔·格德勒那样坚定的人们，
- 以及凭良心勇敢反抗暴政的其他许多人。

抵抗一词与专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任意把它用于当今的事件，那不仅贬低了德国抵抗运动，而且有歪曲历史事实的危险。

国家社会主义者唯我独尊，疯狂反对一切同他们对立的哲学思想，基督徒和社会党人、自由党人和工会活动家、保守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被视为敌人。如果没有政治信仰完全不同的人之间的互相影响，我们德国人1945年以后就不可能大踏步前进。

抵抗运动伟大的道义力量并不是由成功或失败决定的。谋杀希特勒的行动须冒一切风险和代价。亨宁·冯·特雷斯阁上校对施陶芬贝格1943年以后的思想及行动有很大的影响。他曾说过特别令人难忘的话。临死前，他再次阐述了他行动的主要动机：

“我认为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头号敌人，而且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数小时后，当我在上帝的审判席上解释我的行为和过失时，我相信我将能心安理得地解答我在反对希特勒斗争中的所作所为。上帝曾答应亚伯拉罕，即使索杜姆城里仅有十个好人，他也不会摧毁这座城市。同样，我希望为了我们，上帝不要摧毁德国。”

我们深切感激德国抵抗运动的人们。我们对那些宁肯移居国外也拒绝支持或被迫逃离专制政权的人们，也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他们中间，有人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从国外反对希特勒的独裁。有的作家通过文字的力量唤醒全世界，注意德国发生的一切。

多数移居国外的人，离开祖国很不容易，有些人后来也难以回国。因此，我们对那些曾帮助缔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更加感激。直至今日，这种参与仍非常有助于今天为实现和解与和平所作的努力。

我还回忆起一个人，我认为他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伟大的英雄。他叫拉奥尔·瓦伦贝格。1944年，他32岁时冒着生命危险在布达佩斯抢救了成千上万面临死亡威胁的犹太人。1945年，他被驱逐到苏联，此后便下落不明。

我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会谈时，曾提到这位非凡勇士的命运。我非常希望在这一变革时期，在华沙条约各国公开讨论斯大林主义令人沮丧的遗产的时刻，能以使人真正信服的方式，澄清拉奥尔·瓦伦贝格的命运。因此，我很欢迎苏联当局最近邀请拉奥尔·瓦伦贝格的亲属去莫斯科。

六

今天是9月1日，我特别想对德国青年讲几句话。他们既不能作为一个整体为独裁和世界大战而受到指责，因为他们没有犯下这种罪行，他们也不能个别地因此而受到指责，因为他们都太年轻。但是由于过去的历史仍然与我们同在，因此他们承担了责任。没有一个德国人可以逃避这一点。但是我们要经常把历史的包袱看成一个机会。任何熟悉本世纪历史的人都会敏锐地了解到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的危险性和诱惑力。我们还必须抵制今天那种鄙视爱国主义和热爱祖国的诱惑力，因为这些价值在国家社会主义者执政的期间被滥用了。表现出对爱国主义的鄙视就会不知不觉地符合了希特勒的意志。路德维希·克贝克上将曾试图在1944年7月20日进行暗杀，他看到了这一点，并写下了这条伟大的警句：“那个人根本没有祖国”。热爱祖国和热爱自由、爱国主义和欧洲意识决不能再分道扬镳——这是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把诸如勇气、忠诚和奉献精神这类美德同基本的道德标准

牢固地联系起来。例如，联邦国防军的军人不发誓效忠于某一特定的人，而发誓要捍卫40年前颁布的自由宪章《基本法》所体现的各种价值。

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创立人参照德国的历史经验塑造了这个第二个德国民主。他们领导我们的国家走回到自由的传统道路，这个传统是战争和专制都无法摧毁的。

我们以我们的自由宪章感到骄傲，在宪章中我们

- 承认人类尊严在生命的所有领域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
- 反对以战争和武力作为政治工具，并反对任何复仇主义：这个决定在《1950年斯图加特宪章》中得到德国被驱逐出国者的支持；
- 决心实现在一个自由而统一的欧洲建立一个自由而统一的德国的目标。

我国《基本法》的起草者，对受政治、宗教或种族迫害的受害人给予政治庇护，表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个社会的人道精神不仅表现在尊重其本国公民的自由和尊严，并且还表现在对其他国家武力和镇压受害人的同情。

所有这些决定都有助于我国社会日益被人承认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我国对自由和正义作出的承诺如此之大，这在1945年战争和暴政结束时肯定是谁也不敢梦想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40年之后的今天能够说这番话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现在我们亲眼看到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在缔造这个时代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欧洲，整个欧洲正面临着影响深远的变革，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了激烈的转化。自从战争结束以后这是第一次有希望消除东西方冲突的阴影。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大陆所出现的各种发展正吸引着全世界各国人民。有哪一

个国家能比我国对促进自由有更大的兴趣？欧洲那些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僵化结构正在解体，这为我们祖国的统一带来了新的希望。

时间对争取自由有利而不是有害。因此在这个纪念日我们也瞻望未来。虽然在回顾1939年9月1日的历史时感到悲伤，但是我们了解到我们对子孙后代所负的责任。我们是否从战争和独裁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我们是否完成了最后创造一个更好和更和平的世界的任务，有朝一日他们会以此来判断我们。

我们展望未来，希望全世界各国能够在共享自由之下和平地团结起来，我们应当作出不懈的努力，使这个理想变为现实。不要忘记1939年9月1日，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最宝贵遗产。
